

学好用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张晓平 田凌志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第三章指出,要练就驾驭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硬本领。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中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与中国式现代化形成良性互动。面对当前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调整压力,要从提高统筹开放与安全的能力、提升制度型开放能力、打造高水平专业化对外开放工作队伍三个维度,练就驾驭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硬本领。只有不断提高驾驭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能力,才能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

提高统筹开放与安全的能力。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着力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一要增强自主创新竞争能力。紧盯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战略需求,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通过自主研发与产学研协同创新,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拳头产品”,从根本上摆脱同质化竞争,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跃升。二要提升开放监管能力。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构建智能化的风险预警与监管体系,建立覆盖跨境贸易、跨境金融服务、数据跨境流动等关键领域的全景式监测网络,实现对风险的精准识别、动态感知与智能研判。探索建立基于风险和信用的分级分类监管机制,对信用良好、管理规范的国际创新企业减少检查频次,提升监管质效。三要锻造风险防控应变能力。加快建立深度嵌入、智慧高效、自主可控的数智供应链体系,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数智供应链建设和发展模式,筑牢“数智化”供应链安全底座,构建中国企业主动防御体系。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完善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丰富反制工具箱,织密织牢开放安全“法治网”。

提升制度型开放能力。新时代新征程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要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实现从市场准入到规则对接的历史性跨越,进一步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提高运用国际规则维护我国发展权益的能力。一是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健全完善国有企业“走出去”统筹协调联动机制,打造“雁行出海”格局,引导支持“头雁”企业统筹全球行业资源,推动我国全产业链“走出去”;完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抓紧推进电信、教育、医疗等服务领域开放;推动“非禁即入”严格落实,为外资企业创造更广阔、更公平的投资空间。加快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推动数据高效便利安全流动。二是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形成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相兼容、规范透明的基本规则体系。聚焦数字贸易、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竞争政策等重点领域,推动国内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与国际对接。深入研究各类区域贸易协定与双边投资协定的核心条款,并将其全面融入企业经营管理等各环节,以健全的制度全面提升合规风控能力。三是积极参与国际规则 and 标准制定,提升运用国际经贸规则的本领。更好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先行先试和压力测试作用,推动制度创新,做好成果集成,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重点聚焦数字经济、跨境电商、绿色低碳、科技创新等新兴领域,探索形成技术规范 and 治理规则,并借助“多边+双边+诸边”平台,为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与调整作出更大贡献。

打造高水平专业化对外开放工作队伍。加快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高水平专业化对外开放工作队伍,是提高运用国际规则维护我国发展权益能力的重要保障。一是筑牢法治根基,锻造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队伍。建立健全涉外法治人才“选、育、管、用”全链条机制,拓宽选拔渠道,创新培养模式,通过国际交流与实战锻炼,培养一批胸怀大局、精通国际规则、善于处理复杂涉外法律事务的顶尖人才,并优化人才管理使用机制,使其在维护我国发展权益中发挥重要作用。二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人才梯队。深化企业治理结构改革,完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三会”治理机制,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规范决策流程,确保经营决策的科学性与合规性。优化董事会结构,引入具备国际视野的独立董事和战略投资者,设立专业委员会,增强企业在全球经营中的战略决策与风险应对能力。构建内外结合、梯队合理的人才体系,通过内部培养与外部引进,打造支撑企业全球化运营的智力引擎。三是拓宽全球视野,全面提升对外开放队伍的复合能力。着力培育对外开放工作队伍的国际视野与战略思维,更好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提升跨文化沟通与协同能力,有效连接中国与世界;提升数字技能与国际经贸规则运用能力,确保队伍能够适应数字时代的新要求,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作者单位:重庆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为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成果)

■陈刚 宋新宇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指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前沿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在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的当下,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竞争焦点,更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领域。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安全健康发展,是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核心引擎,是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抓手,也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

深度融合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实现创新迭代与产业升级的重要保障,是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必由路径。一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引导科技领军企业主导科技创新全过程,并牵头组建涵盖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创新联合体,将创新型人才、科创平台、基础研究经费、人才自主评定的创新资源向科技领军企业倾斜,增强企业从事科技创新基础研究 with 主导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意愿。二是构建以科技领军企业为核心的产学研协同攻关体系,推进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推动科技领军企业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共建高水平研发平台与创新联盟,促进创新资源开放共享。推动构建以产业需求为牵引、以实际问题为导向的协同机制,引导高校和科研机构从“论文导向”向“问题导向”转变,集中突破关键环节、关键技术、关键材料等“卡脖子”问题,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三是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技术转移、知识产权运营、检验检测等专业服务机构,加快打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加强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基地建设,加快培育专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全链条服务支撑,助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应用和技术扩散。健全职务科技成果赋权与免责容错机制,充分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提高科研成果转化效率。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安全发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能够有效降低对外部技术、资源和市场的过度依赖,保障战略性新兴产业安全发展。一是加强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产品和技术体系,全面摸排梳理产业链的薄弱环节和“卡脖子”风险点。通过推进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集中力量突破高端芯片、基础软件、核心算法、关键原材料、精密仪器等领域的技术瓶颈。积极布局产业链关键环节的备份和替代方案,支持国内企业填补产业链空白,推动形成多元互补、安全可靠的供应链体系,确保在极端情况下战略性新兴产业仍能稳定发展。二是推动价值链向高端延伸。引导和支持企业从加工制造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全力攻坚关键核心技术。重点发展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如先进研发设计、高端系统集成、整体解决方案以及后市场服务等高端业态,推动产业模式从“代工制造”向“自主研发”转变,实现从全球价值链的参与者向主导者跃升,从根本上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抗风险能力。三是强化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关联度。着力培育一批在产业链中占据核心地位的企业主导型“链主”企业,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引领上下游企业共同融入创新链和供应链。推动构建以大带小、以小促大、融通发展的产业集群生态,鼓励园区内、区域内企业间的紧密合作和供需对接,降低交易成本和外部依赖性。建立基于信息共享、物流协同、订单互补的紧密合作关系,提升产业链的整体效率和应对外部冲击的协同能力,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稳定高效的网状产业结构。

统筹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有为政府通过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明确产业方向,弥补市场失灵,防范重大风险,为早期技术提供关键支持;有效市场则通过竞争机制、价格信号与需求牵引,高效配置资源,激发创新活力。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既能避免过度干预导致的效率损失,也能防止无序竞争引发的资源浪费,在激发产业发展内生动力的同时规范发展秩序,实现产业规模、速度与质量、效益的统一。一是充分发挥政府战略规划、政策引导、服务保障的作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需要有为政府的引导与支持,基于国家战略需求与产业发展趋势,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明确重点领域和主攻方向。定期对政策实施效果、技术发展趋势、市场需求变化进行跟踪分析,综合运用税收优惠、专项债券等政策工具,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关键技术领域,激发科技创新活力。建立创新型友好型监管体系,平衡创新激励与风险防范,为科技创新提供制度保障。二是完善市场体系,营造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生态环境。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需创新要素和生产要素的规范流动与高效配置。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使创新资源遵循市场规律向高效益、高创新领域集聚,让市场成为筛选技术路线、推动产业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继续发挥出口对经济的支撑作用

■冉梨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第四章提出,要继续发挥出口对经济的支撑作用。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在稳定宏观经济、促进产业升级、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在此背景下,继续发挥出口对经济的支撑作用,对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多方面协同发力,多维度精准施策,在巩固既有成果的基础上,积极开拓新的增长空间,更好地应对挑战,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积极拓展多元化国际市场格局,筑牢出口根基。既要稳固传统市场,又要开拓新兴市场,降低对单一市场依赖风险,为出口贸易筑牢坚实根基。一方面,巩固发达国家基本盘,向“质”攀升。依托我国完备的产业链基础,推动出口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升级,聚焦高端制造、绿色低碳领域培育出口品牌,实现从“产品输出”到“技术+品牌输出”的跨越。利用好自由贸易协定原产地规则,降低贸易成本、强化区域供应链协同,牢牢稳住市场份额,提升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开拓新兴市场新蓝海,以“快”取胜。由政府、商会牵头组织企业“组团出海”,助力中小企业参与区域性展会、整合物流金融资源。充分发挥中欧班列等跨境通道作用,支持企业在重点市场布局海外仓与构建售后服务体系,打通跨境物流“最后一公里”,大幅提升配送效率与客户响应速度,快速满足新兴市场多样化需求,加速抢占增量空间。

深入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升出口竞争力。优化出口结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一方面,聚力高技术制造业出口,抢占全球价值链高端。针对加工贸易企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研发中心建设等需求,出台精准化扶持举措,加大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信贷倾斜力度,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突破“卡脖子”技术瓶颈,为高技术产品出口筑牢技术根基。引导企业跳出传统的中低端环节,向“微笑曲线”两端的研究设计、品牌营销、售后服务延伸,培育自主知识产权与国际知名品牌,搭建全球营销网络。通过技术独特性与品牌影响力提升产品不可替代性,增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主导权,让高技术制造业成为出口增长的“新引擎”。另一方面,推动传统出口产业升级,激活存量发展新动能。针对纺织、家具、陶瓷等传统产业,推动智能化、数字化设备普及,优化生产流程,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精度。挖掘产业文化内涵,塑造差异化品牌形象,通过品质提升与品牌溢价摆脱“低价依赖”,推动传统产业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让存量产业释放“新活力”。

扩大发展服务贸易与数字贸易,培育出口新动能。服务贸易与数字贸易是重塑全球贸易格局的关键力量,更是我国出口增长的新引擎。一方面,聚焦高端领域,推动服务贸易提质扩容。加大对金融、保险、法律、会计、知识产权等现代服务业的培育力度,通过设立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等,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贸易龙头企业 and 品牌。推动高校与企业共建跨学科实践基地,定向培养服务贸易复合型人才,完善国际高端人才引进“绿色通道”,破解高端服务领域人才短缺难题,为产业发展注入智力动能。依托国家文化出口基地、数字服务出口基地,推动文化、中医药服务、数字服务等特色服务集群化发展,形成“中国服务”与“中国制造”协同出海、相互赋能的良好格局,拓展服务贸易出口空间。另一方面,夯实数字底座,赋能数字贸易跨越式发展。加快5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打通“数字动脉”,为数字贸易发展提供稳定、高效的技术支撑。深度参与数据跨境流动、数据安全、数字货币等国际规则制定,营造开放、包容、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保障我国数字产品与服务的跨境自由流通,为数字贸易发展争取有利国际环境。

持续发挥高水平开放平台作用,强化出口服务保障。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高水平开放平台,不仅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与政策创新的“试验田”,也是衔接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赋能企业出口的战略枢纽。首先,要强化政策赋能,打造高效通关服务枢纽。在平台内率先推行“两步申报”“汇总征税”等通关便利化举措,进一步压缩整体通关时间,降低企业仓储、物流等隐性成本,提升货物通关效率,让企业“快进快出”对接国际市场。赋予综合保税区更多政策红利,支持区内企业开展保税研发、检测维修、融资租赁等多元化业务,引导加工贸易企业从单一制造向“制造+服务”延伸,推动产业链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实现“在平台内升级、从平台内出海”。其次,要促进产业集聚,构建优势互补的“产业生态圈”。推动“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自贸试验区+服务贸易”等业态融合,高效开展跨境电商出口退货、保税展示交易等创新业务,为新型贸易业态提供落地载体,让平台成为出口模式创新的“孵化器”。最后,要优化要素配置,营造开放创新的“综合服务生态”。整合出口信保、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资源,为企业提供“贸易融资+汇率避险+信用保险”一站式服务;依托自贸试验区开展数据跨境传输安全管理试点,探索构建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破除数字贸易、服务贸易企业发展的“数据壁垒”,让平台成为要素自由流动的“便利港”。

(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为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成果)

■梅新想 陶宇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第三章指出,要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市委六届七次全会也指出,要“以内陆制度型开放为着力点加快建设改革开放新高地”。制度型开放作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任务,对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意义重大。要持续推动与国际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对接升级和相通相融,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为打造高质量发展新高地和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提供制度保障。

以制度型开放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面对全球竞争格局加速重塑,亟需通过提升规则引领力、深化制度创新力、拓展全球影响力,奠定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基础。一要强化制度供给,以规则创新重塑产业竞争优势。瞄准新领域新赛道发展前沿,支持龙头企业深度参与国际市场规则与标准制定,抢占未来产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赢得市场主动权,确立在技术范式转型中的战略引领地位,催生更多原创性、颠覆性创新,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二要强化高能级平台赋能,打造制度创新策源地。依托自贸试验区、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等载体,实施更高水平的“监管沙盒”等包容审慎监管机制,开展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更大力度的制度型开放试验,打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培育”全链条服务路径,充分释放平台的资源集聚效应、创新累加效应和产业赋能效应,为实体经济筑基固本。三要深度融入全球治理体系,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畅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等国际物流大通道,建好“两国双园”等跨境合作平台,带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等优势产业实现集群式出海,促进产品输出、产能布局与制度型开放协同并进,不断提升陆上贸易规则在全球经贸治理中的制度影响力,巩固重要合作伙伴关系,积极开拓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市场,加快形成多元互补、纵深联动的国际市场新格局。

以制度型开放激发高质量发展活力。面对国际经贸规则加速重构,亟需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增强全球资源整合能力、激发市场主体创造力,培育高质量发展的持续动能。一要推进边境后管理制度改革,构建一流营商环境。主动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着力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数字贸易贸易创新、绿色标准衔接等重点领域改革,有序扩大服务市场开放,持续破除市场准入隐性壁垒,破除体制机制障碍,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为高质量发展营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二要提升国际通用规则运用水平,激活市场内生动力。支持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相关人员在国际标准组织中担任关键技术职务,将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中国“新三样”领域的先进技术融入国际标准体系,形成“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国际化”的良性循环,降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合规成本与不确定性,打通创新成果全球共享渠道,充分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三要创新规则与产业匹配机制,提高全球资源配置效率。构建国际规则数字化监测平台,运用大数据技术实时追踪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演变趋势;建立国内规则适应性评估体系,定期诊断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的匹配度,改善“监测—评估—响应”动态机制,通过快速修订程序,实现制度体系的动态优化与迭代升级,促进国内外市场联通,参与全球要素资源高效配置,有效提升统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威力。

以制度型开放提升高质量发展能级。面对全球风险挑战加速演变与新一轮科技革命纵深推进的双重态势,亟需通过增强跨部门协同、掌握产业链核心环节主导权、筑牢开放安全防线,打造高质量发展的体系优势。一要建立跨部门协同体系,增强政策集成合力。着力打破区域壁垒和部门界限,通过建立常态化联席会议制度、制定统一改革清单、搭建信息共享平台等措施,将分散在各部门的创新实践在制度型开放总目标下系统集成,形成政策合力,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领域开展联合攻关,通过点上突破带动面上改革,促进各项改革政策的有机衔接和协同推进,更加注重制度型开放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二要构建全产业链赋能机制,强化发展主导权。前瞻布局全球研发中心,深度融合全球创新网络,支持科研机构与制造企业共建“研发设计与技术服务”一体化平台,推动产业形态从单一生产向“制造+服务+标准”输出转型升级,创新“全方位赋能、全生命周期服务、全产业链发展”机制,实现从“被动配套”到“主动引领”的价值链跃升,全面提升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三要完善风险防控体系,筑牢开放安全屏障。加快建设国际风险信息库与多部门情报共享平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风险监测预警模型,实现对国际经贸、金融等领域风险态势的实时感知与智能研判,并进行“分类分级”精准管控。同时,通过设置业务防火墙、实施市场风险敞口管理等措施,建立风险隔离机制,有效防范风险跨市场、跨领域传导,全面提升开放条件下的风险抵御与防控能力。

(作者单位:重庆科技大学,本文为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成果)